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起源与话语分析研究

孙 虎*

[摘要] 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提出哲学的考古学方法,这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起点,对理解他思想的独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唯一明确讨论方法论的著作,注重揭示科学的知识话语类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福柯又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方法,与哲学的考古学方法不同,考古学方法是从一种认识型出发描述历史现象,谱系学引入了权力概念,将不同的认识型看作权力的效果,关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揭示,这是对考古学方法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福柯;知识考古学;认识型;谱系学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完成于1968年、并在1969年出版的唯一明确讨论方法论的著作。福柯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对自己的《疯癫史》(1961)、《诊所的诞生》(1963)与《词与物》(1966)三本书进行方法论总结,在这三本书中他用“考古学方法”来探讨欧洲历史中某一时期出现的新的话语形式。但是,福柯认为在这三本书中这种方法本身并没有得到清晰阐明,甚至还没有完全成型,于是写了《知识考古学》对这种方法进行系统论述。它的核心概念是“考古学”或“考古学方法”,是用哲学方法透视历史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很难归类于传统的哲学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未定型等特点。它本身不是一部与历史进行比较的著作,结果它所确立的研究范式对文学批评与其他一些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了很多学科的一块试金石。“考古学方法”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标志性起点,对理解福柯思想的独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考古学方法的起源

福柯在1954年翻译了宾斯万格的《梦与存在》后写了一篇较长的导读文章,这是他早期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福柯此时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宾斯万格是瑞士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的终身好朋友,是荣格在瑞士领导的“弗洛伊德小组”的成员。宾斯万格是最早结合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对精神病进行心理治疗的医生,他将胡塞尔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看作理解病人主体经验的关键出发点。^②他将存在分析看作一种经验科学,其中包含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路径,以此解释人的个体存在的

*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215009。

^②T. May, "Foucault's Relation to Phenomenology," in G. Gutt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88.

实质性特征。福柯的第一篇独立的文章《精神病与心理学》也写于1954年,从中可以看出福柯这一时期主要受到法国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自己的哲学方法还没有形成。

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开始提出自己的哲学方法,即他自己界定的“考古学方法”,主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欧洲历史演化的规律。福柯完成于1961年的博士论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翻译与解释康德的《实用主义人类学》,另一部分是著名的《疯癫史》。从《疯癫史》开始,福柯开始显示出思想的独特性。在《疯癫史》的前言中,福柯第一次提出了考古学的概念,说他正在做的就是“疯癫”的考古学研究。福柯从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中借用了“认识的断裂”观念,又受到冈奎莱姆《正常的与病理的》一书如何区分“正常的与病理的”的方法论的影响,福柯在《疯癫史》中分析了古典时代出于对秩序的透明性需要,理性如何排除非理性观念构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在这种话语形式的支配下,《疯癫史》描绘社会如何将疯癫归类为精神疾病的显示方式过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分析《疯癫史》中新的话语形式生产过程:“话语形式的理论选择点很容易定位,它的概念系统相对来说不复杂,数量比较少,它的阐释规则相当大地显示为同种类与重复;另一方面,问题存在于一大群高度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客体的出现,有必要首先去描述这些客体的形式,为了确定整个精神病话语特性的精确位置。”^①这里所说的精确定位精神病话语所用的方法就是强加在疯癫之上的“沉默的考古学”。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分析“沉默的考古学”方法时说:“大体上来说,《疯癫史》还是为一个非常神秘的所在提供了一个过于巨大的位置,我向它们呼唤一种‘经验’,如此,显示人们还是倾向承认一种历史的匿名主体与一般主体到了怎样的程度。”^②福柯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在强调认识上的断裂时,却给予了匿名主体或一般主体过于神秘的位置。但是,他已摆脱了传统哲学写作方式,而是通过诊断欧洲历史中特定的革命性的转型时期新的历史话语形式,以哲学的方式透视历史演化的规则。这一特点贯穿了福柯以后几乎所有的写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相似性,尽管这种总体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后来有一些关键性变化。显而易见,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应用考古学方法透视历史话语形式,但是并没有从现象学中决定性地走出来,尽管他从多种角度批判了现象学“先验主体”观念。

《诊所的诞生》是福柯将话语分析上升到结构、体制分析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的副标题为“医学感知的考古学”。福柯在本书中主要考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体制与政治紧迫性相结合产生了现代体制性的临床医学。他将话语分析上升到不同种类的结构,即现代医学的体制性结构。福柯后来在《知识考古学》中反思这种方法时说:“在《诊所的诞生》中,经常诉诸结构分析,有避开呈现的问题,及符合考古学规则的层面的危险。”^③“这个分析很少涉及到概念系统的形式,或者理论选择的形式,而是与话语主体对现状,机构的处所、态势、模式的插入点相关。”^④福柯意识到这种“危险”,认识到这里的医学话语的所指主要指疾病与症状自身,而不应该是医疗体制。所以,在《疯癫史》与《诊所的诞生》之后,福柯减少了制度分析,集中在对话语自身的分析,突出呈现与现状的客观性。如果说《疯癫史》与《诊所的诞生》是话语分析方式的实践性探索,那么《词与物》与《知识考古学》在话语分析上更加强调理论性阐发。

《词与物》的副标题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人文科学”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福柯在这里主要指一种以人的主体为对象的学科,这种主体性试图建立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由此出发解释一切,将一切差异性还原为连续性、统一性。在福柯看来,胡塞尔在先验还原中克服了现象学的心理学,

①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 M. S.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65.

②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6.

③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6.

④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65.

这是回到先验主体的方式,还是一种隐蔽的人类学。福柯从巴什拉的科学哲学中借用了“认识的断裂”(epistemic breaks)观念,他没有使用这个短语,而是用了一个相似的词“知识型”(episteme),用episteme分析历史秩序怎样管理知识生产,在科学话语之内什么可以看作合适的知识。福柯将这种知识型看作处于先验与经验之间的一种知识的形式规则,不是从先验主体,也不是心理学的主体出发,但这个多元透视点到底起源于何处?这里,福柯明显受到了尼采的“自我是效果”观念的影响:没有主体,只有对主体的解释,主体只是冲动的效果。福柯将主体放在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但在主体的理想起源问题上,福柯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回答,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福柯只是分析主体是以怎样的方式显现的,它的分布规则,特别关注在历史话语的断裂空间中主体是如何显现的。由此,福柯只是把目光投向了话语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话语类型怎样与多种主体一起出现。

在《词与物》中,福柯描述这些话语类型的方式就是考古学,还是具有很强的现象学直观的特征,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现象学的影响。福柯主要考察了西方知识型的两次转化: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开始的古典时期,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初的现代时期。他选择了现时代的生物学、经济学与语言学三种人文学科如何描述这两次转化,显现这三门人文学科的知识型转化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由于关注的对象不同,相互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也往往被视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福柯并没有追问这些变化为何出现,而是描绘这种转化在话语层面的具体表现。福柯在这里严格将自己与法国现象学的知觉结构的分析区别开来,不是谈结构本身,而是谈系统、谈隐藏的材料代码决定了什么在清晰的层面展开。福柯认为知识型分析的特点在于,“显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在方式,甚至我们最日常的存在方式,是同一系统组织的一部分,由此,作为科学与技术的世界依赖同样的范畴。”^①福柯反对抽象的人文主义,认为它们与真实的科学与技术的世界脱离开来,这种唯科学的取向本质上与他后来的主体分析存在矛盾。

概而言之,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主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欧洲历史演化的规律,是通过诊断欧洲历史中特定的革命性的转型时期新的历史话语形式,以哲学的方式透视历史演化的规则,然而在提出的过程中受到精神分析学和现象学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福柯从《疯癫史》开始摆脱了传统哲学写作方式,首次提出了考古学方法,但是他并没有从现象学中决定性地走出来。在《诊所的诞生》中,他尝试将话语分析上升到不同种类的结构,即现代医学的体制性结构,这种尝试使他很快意识到危险性,转而集中在对话语自身的分析,突出呈现与现状的客观性。在《词与物》中,福柯进行理论性建构的尝试,他探究主体是以怎样的方式显现的,谈系统、谈隐藏的材料代码决定呈现的现状,它的分布规则,特别关注在历史话语的断裂空间中主体是如何显现的,并且严格地将考古学方法与法国现象学的知觉结构的分析区别开来,总结出知识型分析的特点。知识型的静态分析长期受到现象学的制约,福柯为了摆脱现象学的影响,引入权力的概念,将考古学的研究从认识型的知识观念转向一种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谱系学研究,这是对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考古学与谱系学

福柯真正从现象学中走出来是依靠尼采,尽管尼采不是他走出现象学的唯一动力,但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1969年,克洛索夫斯基出版了《尼采与恶性循环》,该书英译者史密斯在导言中引用了福柯的原话,福柯称这部书是自己读到的最伟大的哲学著作。^②克洛索夫斯基在索绪尔的阿波罗语言学之

^①M.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vol. (2vols.), ed. by D. Defert and F. Ewald, Paris: Gallimard, 2001, p. 546.

^②P.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trans. by D. W. Smith, London: Athlone, 1997, p. viii.

外创立了一种狄俄倪索斯语言学,这本书无疑对福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柯在1970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尝试将话语分析转向更加政治化的领域,关注体制对话语的生产所起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观念,这正是从尼采“道德的谱系”概念借用过来的。然而,尼采很少在福柯的“谱系学”意义上考察历史,两者在实践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如果说尼采观察历史演化的视角比较宏观,是一种宏观的谱系学,那么福柯更加注重对历史演化的细部考察,更加关注一种话语实践的领域。

谱系学与考古学的最重要区别是引入了权力观念。通过谱系学,福柯从考古学的认识型的知识观念转向一种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关注,对知识的认识离不开权力;而在考古学阶段,知识只是与话语的“知识型”联系在一起。福柯建立了自己的谱系学方法后,才决定性地从现象学中走出来,也就是从现象学意义的知识型/知识的静态分析转向了一种权力/知识的动力学生产模式的分析,由此,福柯被称为分析权力的哲学家。他之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带有权力/知识的分析色彩,尽管对权力/知识的运行模式的认识在不断的演进。由此,一般认为福柯的作品是分析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前者怎样用来控制与规定后者,科学知识只是社会控制人与自然的手段。福柯自己却认为他将权力/知识的谱系学方法应用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不是分析作为社会现象的权力,而是分析社会怎样用权力客观化主体的不同方式。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对人口分类与有序化治理的知识的科学权威;曾经存在的对人的主体进行分类与规范化的形式,如通过识别疯癫、疾病、表象特征等;塑造性别、性经验身份认同的冲动方式,训练自己的身体适于常规,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再生产确定的模式。^①

福柯在获得权力谱系学方法之后,并没有否定考古学方法,谱系学是对考古学的深化,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是从一种认识型出发描述历史现象,谱系学引入了权力概念,将不同的认识型看作权力的效果。但是,福柯并没有清晰阐明权力到底是什么。福柯对权力的解释是从经验出发,也就是权力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非理性冲动的效果。福柯从现象层面对权力进行分类,而不是寻找权力的形而上学,或先验的起源,这是福柯最受批判的部分。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福柯的权力观念缺少规范,福柯是用启蒙的原则批判启蒙的话语。这种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击中福柯的要害,因为没有人能够否定权力的非理性特征,以及权力作为自然现象的经验特征。

福柯的权力概念具有非理性的色彩,与尼采的酒神精神具有类似特征。揭示权力的非理性特征并不是否定权力谱系在经验上没有自身的规则,福柯只是认为历史演化中的断裂、转化、空白等空间并不能够由于一元论的、先验的、连续性的解释与压迫而消失,只是被遮蔽了;福柯与尼采共同遇到的问题是:非理性界域不能完全还原为理性的层面得到思考,理性的层面只是非理性界域的效果。权力具有非理性的层间,也具有理性的特征,所以权力只能从理性的层面得到描叙,而理性只是非理性的讽刺画。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权力谱系学的重点不是揭示在欧洲历史演化中为什么出现转化、断裂,而是揭示如何转化、断裂。这样,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历史的不同认识型或权力谱系是如何转化的。福柯在回避权力的形而上学的起源的问题时,他的策略是注重揭示权力谱系或知识型内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从人的个体主体性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谈个体的主体,而是分析一般主体显示的方法,也就是各种主体话语之间的关系;不是分析主体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总体性,而是系统化各种不同话语实践或权力的单位,这些单位不能还原为总体性与个体性,而是分析一种共同场域中各种主体话语单元的结构模式、运行规则。福柯揭示社会知识或权力结构中存在着的大量异质性空间,也就是不同话语实践的主体或权力谱系之间存在的空间,这些空间不能通过一元论或先验还原而消失,历史演化的断裂就起源于这些异质性空间。

^①M.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 Dreyfus &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208—226.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既有成就之上,甚至可以把福柯看作科学至上主义者。福柯极力称自己为一个没有面孔的作者,就像任何科学的解释需要通过个体的主体,而这种个体主体的内在性感知只能是处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一种状态,这一点的确走向了与人文主义对立的另一个极端。我们怎样从主体的内在性获得一种纯客观的视角,这是福柯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谱系学方法虽然引入了权力概念,将不同的认识型看作权力的效果,但是福柯并没有解释权力到底是什么,只是从经验出发认为是一种非理性冲动的效果,而理性层面的思考不能完全还原非理性界域。这似乎又使权力/知识的解释陷入到一个悖论之中,但福柯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将考古学方法深入到话语与陈述观念范畴的研究。

三、《知识考古学》的话语与陈述观念

《知识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五部分,主要对最近的历史方法进行了批判。历史学依赖于过时的不受约束的连续性观念,这种历史是自恋的表现,因为这种历史连续性寻求一种持续的人的主体的先验意识。《知识考古学》的第一部分没有直接马上参与关于“起源——历史——变化”的结构争论,而是参与了范畴的讨论,即人类、意识、起源和主体问题的出现这些交叉错杂和相互规定的范畴。然而福柯认为这里毫无疑问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①在第二部分“话语的规则性”中,福柯追问在历史话语中什么样的统一性存在。福柯尝试性提出了四种假设:统一性基于客体的话语、作者的话语、话语中概念的使用、话语的理论与主题。每一种假设并不是为话语统一提供唯一的基础,而只是话语统一的一个方面。四种假设产生了话语形式可以得以分析的四个特定的层面:客体话语的形式、阐释的位置与模式的形式、理论策略的形式、概念的形式。在第三部分“陈述与档案”中,福柯回到了话语统一性层面,尝试阐释话语形式的最小的元素到最一般的总体性,最小的统一性是陈述,尽管它们没有单个的、稳定的统一性。档案是陈述的一般的形式与变形体系。福柯进而阐释考古学与现时代的历史观念的不同,分析考古学关于起源、矛盾、比较与变化的四种论点。福柯以他的考古学方法代替了连续性与一般性的观念,注重特殊性、差异、不规则的话语。在第四部分“科学与知识”中,福柯认为考古学分析集中在科学史的分析,福柯为考古学辩护,反对人们认为他实质上是一位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最后一部分,福柯总结了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无意识的先验性的解读批判了先验主体解释历史的方法,同时也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目的论。

《知识考古学》是一部非常难读的作品,对这部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限度,这里从知识考古学的“话语”与“陈述”理论入手,尝试揭示本书的一些关键性理论路径。《知识考古学》紧接着《词与物》,采用了一种更加笛卡尔的方式,即论语言本身。^②不过,有别于笛卡尔的地方,福柯的语言分析是一种经验分析,福柯使用了实证性这个词来界定自己语言分析的经验性。这种语言的实证性分析是将一般主体的知识系统客观化,是反先验论的。观念自身就是主体,语言不是主体的标志,语言分析不是探讨理想的起源,而是探讨它于何时出现的。^③福柯提出自己的“历史的先验知识”这样一个实证性概念,以代替胡塞尔的形式的先验知识的现象学概念,“这里的先验的历史知识不是指从未说出的,而是指已经说出的事物的先验知识,在时间之内的话语实践规则的总体,这种话语实践不是外在于历史,而是历史陈述本身。历史先验的知识不是形式的先验知识。它们不是一种性质,不在

^①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页。

^②M. G. E. Kell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1.

^③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72, p.27.

一个层面上,陈述的范围是由历史的先验的知识确定的,由实证性的不同类型标志的。”^①我们很难再进一步揭示,福柯所说的历史的先验知识与实证性知识类型之间的结合点在何处的问题,这有一定的神秘性。福柯将实证性看作一种客观的科学认识论,是外在于主体又内在于主体的一个位置,一个异托邦的位置,但根本上是客观的,这是根本点。福柯通过这个异托邦的位置否定对历史的目的论的一种先验的解释模式,历史无意识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从偶然性角度反思目的论的相对性与在现象层面的绝对性。福柯区分了科学认识论三种主要形式:形式化认识论,数学式认识论,考古学认识论。考古学的认识论是对前两种认识论的超越,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这条轴线不能摆脱主体性的指针,它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②也就是说,福柯回避了话语实践的主体性内在维度,而是将话语实践放在第三人的位置来思考,这是福柯考古学话语分析的出发点。

在探讨话语实践时,福柯在考古学分析中引进了“话语”(discourse)和作为“话语的单位”的“陈述”(énoncé)这样一对范畴;“话语这个术语可以被确定为:隶属于同一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正是这样,我才能够说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③话语是陈述的系统,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的基本单位。^④福柯受英国分析哲学的话语实践理论影响,认为陈述是一种话语行为,陈述是语言作为话语实践的基本统一单位。但福柯并没有谈语言形式或话语行为的规则本身,而是谈历史中的话语实践。他认为,陈述不是命题单位,不是语法上可分离的句子,也不是言语行为的单位。陈述不是形式分析的范畴,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事物的范畴概念。陈述是形式的显现的实事范畴,如果没有陈述就没有语言,但陈述不依赖语言,语言和陈述不在相同的存在层次上。例如,统计学家偶然使用的数字表,这些数字没有任何一个句法结构连接起来,但这是一个陈述。^⑤

福柯将语言与物质性联系在一起,陈述不是纯粹的语言分析,是在物质性上与语言相结合的界面得到分析。语言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物质性存在,“陈述总是通过物质媒介被给与。”^⑥它总是具体体现在声波、纸张上的墨迹中。不过,物质性只是体现话语特殊性的一个方面,福柯并没有将语言缩减为物质媒介本身,如书籍、墨迹等,每个陈述的物质的的人工制品不存在简单的映射,同一本书的不同复印本不是不同的陈述。^⑦如《恶之花》的不同版本不构成不同的陈述,而是同一个陈述,但波德莱尔大脑中的《恶之花》与写在原稿中的《恶之花》就是不同的陈述;键盘的字母不构成一个陈述,但将键盘的字母写在纸上,这些纸上的字母就构成一个陈述,因为一种历史的关系建立起来了。

福柯在“陈述”观念中提出了一种无形体的(incorporeal)物质性观念。^⑧无形体的物质性观念看起来是一个悖论,福柯将这种无形体的物质性的话语行为看作事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指出:“事件既不是本质,也不是意外,不是质,不是过程;事件不是肉体的秩序,它也明确不是非物质的;这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效果,它是效果;它有它的位置,存在于关系之中:共存、分散、交叉检验、积累、选择物质元素;它确定性不是行为,不是身体的属性;它作为效果出现,内在于分散的物质。让我们说,事件的哲学不得不在一眼看上去无形体的物质性观念的悖论方向伸展。”^⑨陈述的物质性相当于一种制度的物质性,而不是纯粹的人工制品。^⑩“这种重复的物质性特征化阐述

①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67页。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36页。

③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6页。

④福柯:《知识考古学》,第98页。

⑤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06页。

⑥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0.

⑦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2.

⑧M. G.E. Kell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el Foucault*, p.11.

⑨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231.

⑩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3.

功能揭示陈述作为一种特殊与悖论的客体,也是人们生产、操纵、使用、转化、交换、合并、分解、改组,可能毁灭的那些客体中的一个。”^①福柯认为,话语作为事件,离不开生产话语的功能系统。陈述与句子、命题或语言行为不具有相同的单位,不受同样的标准约束。陈述是某一分析一个可测定的分割,它更像是一种功能,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可以通过分析或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不产生意义。话语的形成,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所屈从的条件称为形成的规则,在一定的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某一话语事实的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排斥其他话语,它是怎样占住任何其他一种话语无法占住的位置。^②“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但这个位置不是只此一次地被确定并一成不变始终保留在某个文本、书或作品的行文之中,而是在变化。”^③“陈述没有联结范围的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没有一个不是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没有一个陈述的周围没有一个共在的范围、体系和连续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陈述是把意义的单位置于某个它们在其中不断增加和积累的空间的東西。”^④

福柯在分析陈述的功能系统时看似具有结构主义的色彩,福柯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想将结构主义带到它的合法性之外,人们必须承认他从没有在《词与物》中用结构这个词,现在不要让我们再纠缠他是否是结构主义者这个问题的争论。结构主义定义了重复出现的元素与它们的对应形式,以及个体化的原则;建立了建构、等效、转变的原则,甚至主体的无意识形式。但结构主义还是具有一个匿名的先验主体,结构主义的起源观念是模糊的,在这种模糊的起源观念的基础上,主体性隐藏了它自己的超然存在。^⑤福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还是与尼采的永恒轮回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尼采在永恒轮回思想中揭示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演化规则,福柯在这种同一性与差异性观念中引进了前话语形式观念,否定了历史话语可以还原到一个无差别的先验的起点,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理想的起源观念,福柯在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中看到了这种影子。

福柯对话语与陈述观念范畴的研究,使用了实证性来界定自己语言分析的经验性。语言的实证性分析是将一般主体的知识系统客观化,是反先验论的。福柯回避了话语实践的主体性内在维度,透过话语实践的基本统一的单位——陈述的分析,将话语实践放在第三人的位置来思考。陈述不是纯粹的语言分析,是在物质性上与语言相结合的界面得到分析。语言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是一种无形体的(incorporeal)物质性观念。福柯在突出陈述的物质性同时,进一步探究陈述是否产生意义或不产生意义,他认为陈述是把意义的单位置于某个它们在其中不断增加和积累的空间的東西。话语是陈述的系统,陈述是话语的原子,由陈述与话语关系的分析进而深入到历史话语的演化模式的研究。

四、历史话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

《知识考古学》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历史话语是以何种方式展现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关系?关于历史话语的演化模式,福柯面对四种模式的讨论:第一种,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起点与终点的“自在自为”模式。历史演化的过程只是绝对精神的自身显现,历史话语建立在绝对统一性基础上,其实最终消除了差异性。福柯将黑格尔的历史话语的解释原则看作历史决定论。第二种,胡塞尔现象

①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105.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第33页。

③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19页。

④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07页。

⑤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p.201—202.

学模式。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又回到了先验唯心主义,这其实悬隔了历史话语变化的维度,由此消除了差异性。第三种,海德格尔在现象学中通过本体论差异观念重新开启了差异性,但海德格尔的“存在”自身不可说让差异性本身晦暗不明,陷入了神秘主义的诗意的宗教。福柯描述了海德格尔对历史话语的解释,“话语的秩序……在任何显然的开端之外,总有一种神秘的起源——如此神秘、如此根本,它决不能由自身获得理解。通过年代学的素朴行为,不可避免导向一个回溯的点;这个点只是它自身的空无;从这个点,所有开端也就是重新开始或掩蔽。”^①第四种,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福柯认为他的结构主义的历史无意识概念隐含先验主体观念。列维·斯特劳斯受到卢梭、弗洛伊德的影响:卢梭的自然法观念是现代人的虚构,历史中并不存在这种自然状态,这也是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念是静态的,自我与超我成了本我的镜像,这是将欲望进行了一种先验唯心论的解读。这些思维模式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对历史话语的解释,他的结构主义本质上是静态的,不同话语的转化可以还原为源初的、同一性结构不同形态的表现,结构陷入无意识,从卢梭的自然法观念中获得了历史话语演化的无意识基础,由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念是先验的、静态的。这里,差异性并没有真正出现。对于结构主义,福柯这样分析,“所有显明的话语神秘地基于一种‘已经说出’;这种‘已经说出’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说出的句子,或一个已经写出的文本,而是‘从未说出’,一种非形体的话语,一个沉默的、叹息的声音,……它的功能是确保话语无限的连续性,在一种连续重复出现的空无的交互影响之下,它对自身神秘的显现。”^②

福柯的考古学规避先验一元论的起源观念,也谨防将差异性诉诸于神秘的、统一的无意识观念;不过,福柯同样遇到了困难,他只是将一元论的起源观念转向差异性的、多元的源起观念。^③尼采无疑对福柯具有更决定性的影响。尼采在谱系学、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观念中强调话语谱系的不同来源,他关于话语统一性与差异性的解释模式是这样的:不同的道德谱系之间形成了一个力场,不同的道德谱系的总数是有限的,而这些道德谱系的总数演化的时间是无限的。尼采为道德谱系的演化提供了一种有限与无限的解释方法,不同的道德谱系之间的差异不能还原为同一性,所以是差异的道德谱系在永恒轮回。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并没有真正引入权力的观念,而是从作为权力效果的话语构型的系统来描绘考古学的结构系统。福柯的重点不在于对道德的谱系进行分析,而是从社会生产一般主体的角度分析话语的生产模式,集中描述话语结构的系统,话语演化的连续与差异位于不同的一般主体相互之间的异质性空间;规避从一元论的先验论角度将历史话语的断裂还原为同一性与连续性,因为这消除了真正的断裂;而是从多元的不同话语类型之间的关系角度寻找差异性的起源。这样问题就转化为:所谓的历史话语的断裂只是力场中不同的话语类型改变了主导地位。如此,在断裂之处,只是整体力场中隐蔽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话语改变了它们以前在力场中的地位。

由此,福柯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将不同的话语类型还原为它们有限的话语原型。在尼采的道德谱系的方法论中,道德的不同谱系可以找到各自的原型,《知识考古学》中并没有尼采这种清晰的话语原型观念,由此,福柯不可能清晰描述不同的话语类型是怎样在断裂之处产生连续性,因为福柯此时还缺少有效的描述方法。福柯认为,“考古学所涉及的范围不构成一门科学,一种合理性,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而是实证性际的交错,这种实证性际的界限和交叉点不可能被一下子确定。”^④“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断裂是话语形成规则的转换名称。法国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复杂的、相关联的、可描述的转换整体,至今的考古学分析均以它为中心。”^⑤考古学分析

①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25.

②M.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25.

③杜小真编:《福柯集》,王简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④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05页。

⑤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29页。

历史话语的变化与转换,转换有一种连续性转换,也有断裂性的转换,断裂是一种矛盾的异质性空间的相结。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考古学是为了固定历史才研究历史,在考古学寻求实证性的共时性,作为替代的瞬间性的时间消失了,话语摆脱了变化的规律,建立在一种不连续的无时间性之中,通过片断而被固定,一些永久性的不牢固的碎片。^①断裂永远是存在于确定的实证性之间的由不同的转换说明的不连续性。因此,考古学断裂分析的主旨是在如此之多的变化中建立相似和差异、等级、补充、巧合和差距,简言之,是描述不连续性的扩散。^②

五、结语

《知识考古学》以揭示科学的知识话语类型为目标,是一部理论总结性著作,福柯称之为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方法是从一种认识型出发描述历史现象,特别关注在历史话语的断裂空间中主体是如何显现的。在研究中他引入了权力概念,将不同的认识型看作权力的效果,关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揭示,但是福柯并没有解释权力到底是什么,只是从经验出发认为是一种非理性冲动的效果,而理性层面的思考不能完全还原非理性界域,这似乎又使权力/知识的解释陷入到一个悖论之中,但这样的探究是有意义的。这样,《知识考古学》整个理论策略经过尝试最终总结为:福柯的出发点是以支配、屈从、对抗来描绘话语类型的关系,其实是不同的一般主体类型之间的关系;话语是欲望的效果,精神与肉体的二元论转化为主体性与欲望的二元论关系,主体性与欲望同时显现,二者均不可以回溯为先验的本体论。知识考古学只描述现象,知识是以概念的系统描绘不同话语之间的支配、屈从、对抗的关系样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描绘话语的断裂?如果断裂之处只是不同的话语类型在力场的整体性中改变了各自的位置与形态的结果。一般主体作为相互话语类型作用与反作用的效应,因为一般主体没有原型,福柯为了阐释一般主体的出现就需要深入到生产一般主体的不同话语类型的分析,而一般主体又反过来规范着不同话语类型的生产,这种循环论证并没有很好解决话语的连续性与差异性问题的,这使福柯在阐释话语的断裂时也同样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

(责任编辑:杨嵘均)

Analyzing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Its Origin and the Concept of Discourse

SUN Hu

Abstract: In the 1960s, Foucault developed an archaeological method for philosophy, which is an important land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s, and thus has decisive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ness of his thoughts.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is the only book in which Foucault discusses his method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he put forward another method of genealogy, which actually deepened his previous archeological methodology. Different from philosophical archaeological method which describes historical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ccession of epistemes, the genealogical method takes power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ri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knowledge.

Key words: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episteme; genealogy

^①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13页。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26页。